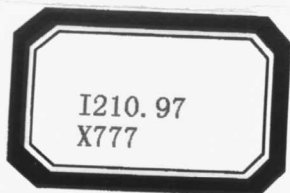


中国新文学研究书系

鲁迅学文献类型研究

徐鹏绪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郑州大学 *04010171566V*

中国新文学研究书系

69
鲁迅学文献类型研究

徐鹏绪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01118/04

I210.97
X77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学文献类型研究/徐鹏绪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12

(青岛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书系)

ISBN 7-5004-4971-2

I. 鲁… II. 徐… III. 鲁迅(1881~1936) - 文献 - 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7804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责任编辑 郭 媛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新奇设计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010-64031534(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4.75

插 页 2

字 数 407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	-------

第一编 鲁迅原典文献类型

第一章 鲁迅原典文献类型	(17)
第一节 古典文学文献类型	(17)
第二节 现代文学文献类型	(23)
第三节 鲁迅原典文献类型	(34)
第二章 鲁迅原典文献类型举要	(58)
第一节 单行本	(58)
第二节 选集	(85)
第三节 全集	(92)
第四节 具有类书性质的言论、专论集	(102)

第二编 鲁迅生平文献类型

第三章 表谱	(109)
第一节 年表	(110)
第二节 年谱	(118)
第四章 传记	(131)
第一节 自传	(132)
第二节 他传	(140)
第五章 回忆录	(166)

第三编 整理鲁迅原典所产生的文献类型

第六章 鲁迅学目录类型	(189)
第一节 目录与目录学	(189)
第二节 鲁迅学目录类型	(202)
第三节 鲁迅学目录的特点及展望	(229)
第七章 鲁迅原典文献版本类型	(235)
第一节 版本与版本学	(235)
第二节 鲁迅原典文献版本类型	(240)
第八章 鲁迅原典文献注释类型	(273)
第一节 注释概说	(273)
第二节 文学注释的沿革	(280)
第三节 鲁迅原典文献注释类型	(285)
第九章 鲁迅原典文献校勘类型	(307)
第一节 校勘与校勘学	(307)
第二节 鲁迅原典文献校勘内容	(312)
第三节 鲁迅原典文献校勘方法	(318)
第四节 鲁迅原典文献校勘成果类型	(329)
第十章 鲁迅学考证类型	(333)
第一节 考证的历史发展	(333)
第二节 鲁迅学考证的特点	(335)
第三节 鲁迅学考证成果类型	(340)
第十一章 鲁迅原典文献辑佚类型	(344)
第一节 辑佚的历史发展	(344)
第二节 鲁迅原典文献辑佚的特点与分期	(349)
第三节 鲁迅原典文献辑佚成果类型	(355)

第四编 鲁迅研究的文献类型

第十二章	鲁迅研究的文献类型	(363)
第一节	论文	(363)
第二节	专著	(386)
第三节	丛书	(400)
第四节	鲁迅研究专刊举要	(402)
第五节	工具书	(420)
第十三章	鲁迅研究之研究的文献类型	(427)
第一节	鲁迅研究史	(428)
第二节	鲁迅研究概论	(455)
第三节	鲁迅研究资料汇编	(461)

绪 论

一 文献与文献学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孔子《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在这里说，夏、殷之礼因有文献作依据，故他可以说清楚，而杞、宋无文献可征，所以不能随便乱说。朱熹注文献一词：“文，典籍也；献，贤也。”称文为“典籍”，献为“贤人”。宋元之际马端临撰《文献通考》，第一次以“文献”作书名。他在自序中说：“引古经史，谓之‘文’，参以唐宋以来诸臣之奏疏、诸儒之议论谓之‘献’，故名曰《文献通考》。”他承袭朱熹之说，将“文”解释为“古经史”，而将朱熹释“献，贤也”的“贤”扩大而为“诸臣”和“诸儒”，并指明朱熹所谓“贤”乃是贤人之言，也就是他说的“诸臣之奏疏、诸儒之议论”。马端临释“文”为叙事之文，“献”为论事之言，比前人对文献的解说要更为明确合理，故为人们所接受。后来，“文献”一词便用来指称载于各种载体的有历史价值的语言文字资料。

一个民族和国家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这样的语言文字资料便会逐渐积累增多起来。为了使这些不断增长的文献在当时发挥作用，也为了便于保存、积累和流传，就需要对它进行整理，使之条理化以便于利用。文献整理工作，早在先秦就已开始。据《左传》等史书记载，周室和各国的图书均已分类收藏。《国语·鲁语》还记载了周宣王时宋国大夫正考父曾依照周朝太师《商颂》之底本，校

订宋国保存的商代祭祀乐歌，并确定以《那》为篇首。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关于校勘古籍的记载。后来，孔子也曾对古代文献进行过认真整理。《易》、《书》、《诗》、《春秋》等都是经过整理的文献。

秦始皇“焚书坑儒”，加之秦末战乱兵燹的毁坏，中国古代典籍遭受空前浩劫。西汉“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①，从民间学者、诸侯王至朝廷，掀起了搜集、整理和传授先秦古籍的热潮。汉景帝时便出现了“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的局面。汉武帝建立藏书制度，又进一步大规模征集图书，出现了国家藏书“积如丘山”的盛况。至成帝时，在广求天下遗书基础上，刘向、刘歆父子受命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文献整理工作。整理工作具体包括：（1）对以单篇形式流传或虽已成书但篇章错乱的先秦古籍，审定篇目篇次，形成定本，有的还拟定书名，校定文句。刘向称此项工作为“校讎”。（2）编写叙录。即对每书写出提要或题解，对作品加以辨析评介，其中也包括判定书之真伪的“辨伪”工作。（3）编纂分类目录。每校理一书成，“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②。刘向将以单篇形式随原书一起上奏的叙录，从各书中抽出，把众多的叙录编纂到一起，名为《别录》。刘向死后，其子刘歆承父业，在《别录》基础上编成《七略》，这是我国最早有规模有系统的分类图书目录。因为当时朝廷的这次文献整理工作一开始就是有明确分工的，光禄大夫刘向负责校理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这种分工，实际上也是一种图书分类，按大类分头校理。因而《别录》、《七略》也是分类编排的。其分类采取的是“六分法”即将当时图书分为六略或六部：《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在六略之上又有一篇《辑略》，汇集六略中各种著作的小序以作为全书总略。每一略中又有总序，总论一略之学术源

① 《汉书·艺文志》。

② 同上。

流，具有学术概论的性质。《别录》、《七略》共著录各类典籍 38 种，590 余家，1300 余卷，全面反映了东汉以前的文献概况和学术源流。

作为这次校理古代典籍的重要成果《别录》、《七略》，它本身固然已成为中国古代文献学中目录学的经典著作，而且通过它所反映出的刘向、刘歆整理古籍的思路以及整理过程中形成的一套原则和方法，对后世影响深远，而且对我国古文献学的建立意义重大。后来班固删取《七略》，撰成《汉书·艺文志》，在分类法上也承袭《七略》分为六略，38 种，596 家，成为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

《七略》和《汉书·艺文志》都把诗赋单独编成《诗赋略》，以与六艺诸子相区分，体现了编者的文学观念和文体意识，说明他们已经注意到诗赋作为文学作品具有不同于学术著作的特点。《诗赋略》实际上成为我国第一部文学目录。

汉代以后，历朝统治者组织人员修前朝之史，新的史志目录不断产生。史志目录的编写，往往伴随着对国家藏书的校理。兵燹之后，盛世之时，也总有修书修史之举和大规模校理古籍的行动。不仅如此，这种官方行为，也影响到民间。学者个人修史校书之风也逐渐盛行起来，在中国文化领域形成了重视文献搜集整理的历史传统，在这类工作中，研究者对古籍的辑佚、校勘、辨伪、编目、注疏等都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和一些必须遵守的规则。渐渐地，又有人对这些整理文献的方法和规则加以梳理、总结、概括，于是便形成了我国古代的一种重要学科——文献学，成为古代学者治学必备的基本功和治学的基本途径。至宋代，郑樵著《通志》，其《校讎略》被视为第一部有关校讎的专著。该书进行校讎理论的建设，对求书、校书方法有精辟的见解。清代乾嘉时期朴学兴盛，考据学家在古籍整理方面成绩卓著。章学诚《校讎通义》正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文献学名著，总结了刘向以来目录学的丰富经验，对郑樵的学说有所匡正和发展，倡言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研究目录学的门径。

纠正了把目录学视为简单记载图书的错误观点,认为目录学不仅仅是为学术研究提供资料,它本身就应把学术包含在内,从而大大提高了目录学乃至文献学的地位,对从事此项事业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总之,作为整理文献学问的文献学,是在我国历代文献整理中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的。但我国古代一直没有正式提出“文献学”的概念。正如张舜徽在《中国文献学·序论》^①中所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讎学家。所以,校讎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最早使用“文献学”概念的是梁启超。他在论及全祖望时说:“其后斯同同县有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②后来又 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③最早以文献学命名的中国文献学著作是郑鹤声、郑鹤春于1928年编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文化史上,文献学作为一门学科,伴有本学科专著出现,似起于此时。”^④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之后,文献学具有了更明确的学科意识。不但出版了多种概论性质的文献学,如被称为“奠定了中国文献学的理论和学科体系”的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等,而且包括《中国文学文献学》^⑤在内的各个学科的文献学著作,文献学的分支学科,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等方面的著作,也都纷纷出版。就文学文献来说,出版

①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③ 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96页。

④ 冯浩菲:《我国文献学的现状及历史文献学的定位》,载《合肥》《学术界》2000年第4期。

⑤ 张君炎:《中国文学文献学》,齐鲁书社1982年版。

了《中古文学文献学》^①、《隋唐五代文学史科学》^②、《元代文学文献学》^③之类的断代文学文献学著作。甚至还出版了关于司马迁《史记》方面的专人专书的文献学著作，可谓极一时之盛。

二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

文献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分化出一些独立的分支学科，如前面所提到的版本学、目录学等等。而且，科学研究又分为不同的学科，因而就会产生不同学科的文献和不同学科的文献学，例如文学文献学、历史文献学、科技文献学等。

文学文献学是伴随着文学文献的不断积累和文献学家文学意识的不断觉醒而从一般文献学中分化出来的，当然这种分化也反映着一般文献学本身的进步与发展。而且，文学文献学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又会继续分化。前面提到的《中古文学文献学》之类的断代文学文献学，便是这种发展分化的结果。这种各历史阶段的断代文学文献学的不约而同地推出，反映了学术界某种共同的需要、某种学术思潮，也是中国文学文献学发达繁荣的重要标志。

这样看来，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建立，也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现代文学，起始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终止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文学，它已经成为历史。这一时代的文学作品也已成为历史文献。搜集、整理、研究这些文献，也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学科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建立便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要求。

实际上，搜集、整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工作，至迟在20世

① 刘跃进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② 陶敏、李一正著，中华书局2001年版。

③ 查洪德、李军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纪30年代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①时，便已有规模地展开。这个“大系”，是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一部很有分量的文学总集，对于现代文学来说，其意义甚至不亚于《文选》之于中国古代文学。赵家璧发动了包括鲁迅、胡适、茅盾在内的一批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和健将，一起来搜集编选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文学作品，按体裁分编为十大卷，各种文体之前均有编选者所写的长篇序文，全书由蔡元培撰写总序，而且第十卷便是由阿英所编之《史料卷》。从文献学角度看，这是一次十分规范的文献整理的大行动。赵家璧本拟再续编第二个十年的大系，但因日军侵华而未果。鲁迅逝世后，《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又带动了作为“别集”的作家个人文集的整理与编辑。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作家作品的出版更是有计划分步骤地持续进行，十卷、十六卷注释本《鲁迅全集》的出版，代表建国后作家“别集”出版的水平。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有影响的现代作家的全集、文集、选集陆续出版。到目前为止，几乎稍具影响的现代作家都有文集或选集行世。现代文学“总集”的编辑出版，除续编赵家璧未完成的第二、第三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②外，还有为了配合高校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的作品选集的选编。开始，往往是各高校自编自用，1979年6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包括《文学运动史料选》、《短篇小说选》、《新诗选》、《散文选》和《独幕剧选》五种。第一次印刷印数达12万套，是一部较大规模的影响面甚广的现代文学作品选集。近年来，综合的和分文体选编的现代文学作品选集大量出版，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总集”的研究文献。中国现代文学报刊，是现代文学不同于古代文学的一种新的作

①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1936年版。

② 《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1989年版；《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品载录方式。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些报刊也成了研究现代文学的历史文献。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 80 年代后，一些重要期刊陆续被影印出来。1988 年天津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唐沅、韩之友等人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为研究者充分利用这些现代文学的第一手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且还出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一类的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期刊杂志。

在现代文学的研究对象中，除作品外，作家的生平史料要算是最重要的了。与作品搜集、整理的同时，作家生平史料的挖掘、抢救、整理、出版也在积极地进行。健在现代作家和已故作家的知情亲友，纷纷撰写回忆录。为了“抢救”史料，研究者们还登门访问作家本人及知情人，写出了数量可观的访问记。现代作家的年谱、传记的编写，也形成一定规模。以鲁迅为例，有关他的回忆录，早在他去世不久就已经有了许多。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出版了由周作人、周建人、许广平、冯雪峰、唐弢等亲友所写的一系列回忆录。后来又有对回忆录的选集和汇编。较大规模的汇编本，有 1981—1986 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薛绥之先生主编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全书分五辑六巨册计三百余万字，是对现存回忆录的一种摘录式的汇编。1999 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由鲁迅博物馆王世家等人编选的《鲁迅回忆录》，是一套集大成式的鲁迅回忆录的汇编本，分散篇和专著两卷。可以说关于鲁迅的回忆录，无论是单篇的，还是成本的，都已完整地收录其中。以鲁迅博物馆四卷本《鲁迅年谱》为代表的私家和集体编撰的年谱，亦不下十数种，或长或短的《鲁迅传》也有数十种。

除以上两种原始文献外，还有为整理、编辑、研究这些文献而派生出来的再生文献或曰二级文献。如关于现代文学作品的辑佚、校勘、辨伪、注释、目录，以及对作品和作家生平史料的考证等等，也出现了一批成果；又如对现代文学作家作品和重要文学现象进行具体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对现代文学进行综合研究的《中国现

代文学史》(包括论述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现代文学史著和研究某一文体发展的体裁史等),以及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再进行研究的学术史或曰史学史,对现代文学研究进行研究的“研究概论”等。还有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对这些成果进行梳理,以为现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学术史研究提供资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和研究目录索引类的工具书的搜集、整理、选编与出版。甚至有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专科辞典和现代作家的专入辞典。另外,有专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队伍,有专门发表研究成果的阵地,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团体。

凡此,都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存在,无论从类型,还是从数量上说,都堪称完足齐备。从类型上看,不会再出现新的文献类型;从现有的数量上看,也已收集丰富齐备。即使再有新的材料被发现,也不足以改变根据现有资料对整个现代文学及其重大问题的研究结论和总体评价。也就是说,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研究对象这个角度来看,建立这一学科的客观基础条件已经成熟。

从主观条件来说,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学科意识,已经历了从初步觉醒到深刻认识的发展历程,目前已成为研究界的一种共识。

远的不说,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即不断有人发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呼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刊登了已故学者马良春《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一、二、四期,分上、中、下连续刊载了著名学者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他们在文章中呼吁研究界要重视史料工作,倡导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建立,对以往史料工作的经验教训加以认真总结,并对今后的史料研究和文学学科的建设提出一些初步的设想和建议。这说明,研究界一些有影响的学者早已有了明确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学科意识。

1986年北京语言学院出版了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虽然作者本人认为该书“不是理论性著作”，内容还不够厚重，但它毕竟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第一部专著，其开拓之功不可抹煞。该书运用乾嘉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搭建全书构架，梳理新文学史料的方方面面，其思路和做法，都是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值得后来者重视。但还应注意吸收西方现代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中的合理部分，以建构新文学文献学的框架和体系。朱金顺先生以自己的学术实践，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给予这一新兴学科以有力的支持。1989年，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成立，现代文学著名学者马良春任会长，徐迺翔任副会长，标志着现代文学文献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已进入一个新阶段。

2003年12月20—21日，“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在清华大学召开。《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6期刊发了由解志熙整理的会议“共识纪要”，介绍了与会者的七点共识。会议认为，“搜集和整理现代文学文献已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而做好这项工作首先是每个现代文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并且提出“应该强调学术创新必须建立在充分和可靠的文献史料基础上”，并把这个问题提高到“学风”、“学术道德”和“学术纪律”的高度来认识。会议呼吁加强现代文学学科建设，提高文献搜集、整理和研究的水平，建立加强学科内部的协作机制，实现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并提出，“是否尊重他人在文献发掘上的劳绩以及是否遵守文献援引的规范，乃是衡量学风和学术道德的重要指针”。这次会议的召开，证明了建立现代文学文献学学科，已是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共识。

从人力资源说，现代文学的研究界早已有人从事新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实践，培养了一批具有严谨学风的学者，上述各类文献，正是他们辛勤劳作的结果。

三 鲁迅学文献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体系

鲁迅学已成为当今显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比“红学”更具有完整的体系。它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可以说，对鲁迅的研究水平，就代表了现代文学的研究水平，是现代文学研究水平的最高体现。

我们说，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无论从数量，还是从类型上说，都已堪称完足齐备，因而已具备了成立学科的客观条件。实际上，首先是指鲁迅学文献已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因而，鲁迅学文献学的体系搭建起来，现代文学文献学也就同时具备了一个基本的体系构架。

如何建立鲁迅学文献学体系的问题，实际是现代文学文献学学科建立的首要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实质，乃是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首先要解决和确定该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研究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要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研究；研究的基本步骤怎样。一个学科的体系，正是由对这些问题的合理的科学的解答而建立和确定下来的。

研究对象或曰研究内容，乃是构成一个学科本体论的基本内涵，也是构成学科体系的基础。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文献本身（包括它的内容和形式）。研究的目也就是文献学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便是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保存和文献的检索利用。学科本体论决定它的方法论。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既然是文献，研究的目的或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文献的整理和利用，那么，文献学的方法也就是整理和利用文献的基本方法。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文献学已通过历代文献整理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的基本方法，这就是版本的鉴定，校勘的进行，目录的编制，文献的辑佚、改正、辨伪与注释。这些方法在不断运用中又形成了文献学的分支学科：校勘（讎）学、目录学等等，把文献的整理和利用，推向新的

更为科学的境界。

据此，本书作者认为，现代文学文献学的体系，也只能围绕着文献的存在形式和对它的整理、研究与利用而构建。也就是说，现代文学文献学体系，并非出于哪个天才人物的随意构想，而是有它的客观依据，有它的逻辑基点，这就是现代文学文献本身的存在方式和整理利用方式，总而言之是由这个学科的本体论内涵和方法论所决定的。

本书采用文献类型学的思路来构建鲁迅学文献学的体系构架，称本书为《鲁迅学文献类型研究》，就正是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坚定不移地认为，文献学只能以文献本身与对它的整理利用为学科基点，而文献类型学从文献的产生和产生后存在的类型着眼，就最能体现我们的这一种认识。事实证明，这种构架能够比较充分地把现有的文献网罗进来，并能构成一个具有内在联系又层次分明的体系。

本书按照文献类型，把鲁迅学的文献分为如下几个层次：

（一）鲁迅学原典文献。包括鲁迅的全部著译，即鲁迅的五种创作、杂文、日记、书信、学术著作、译作、古籍整理（含译文序跋和古籍序跋）等。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不同于古典文学文献的一个重要之处，就是一些散篇文献大都在报刊上首先发表，然后再结集成单行本，收入选集、全集，或收入与其他作家的作品混编的总集。按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的称谓，许多作家作品的混编本，无论是“全”的（如《全唐诗》、《全宋词》），还是“选”的（如《昭明太子文选》），都一概称之为“总集”；而单个作家的文集则称之为“别集”。古代作家文集一般带有全集的性质，因而《鲁迅全集》应该属于“别集”。《鲁迅全集》经过多次精益求精的编辑，至1981年16卷本《鲁迅全集》注释本出版，它不仅成为鲁迅学文献学，而且也是整个现代文学文献学中“别集”编辑的典范。单行本和选集（自选集）是在报刊发表后，由鲁迅个人编辑或选集的一种文献存在形式，与报刊